

● 杨柏岭 著

晚清民初词学思想建构

●

安徽大学出版社

● 杨柏岭 著

晚清民 初 学 思想建构



● 安徽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晚清民初词学思想建构 / 杨柏岭著. — 合肥: 安徽
大学出版社, 2004. 9

ISBN 7-81052-877-7

I. 晚... II. 杨... III. 词(文学)—文学研究—
中国—清后期~民国 IV. I207.2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4)第 071394 号

本书得到安徽师范大学出版基金、安徽
师范大学中国诗学研究中心项目基金资助

晚清民初词学思想建构

杨柏岭 著

出版发行	安徽大学出版社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合肥市肥西路3号 邮编 230039)	印 刷	合肥远东印务有限责任公司
联系电话	编辑部 0551-5108348	开 本	850×1168 1/32
	发行部 0551-5107784	印 张	13.25
电子信箱	ahdxchps@mail.hf.ah.cn	字 数	290 千
责任编辑	谈 菁	版 次	2004 年 9 月第 1 版
封面设计	孟献辉		2006 年 1 月修改
照 排	合肥述而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印 次	2006 年 1 月第 2 次印刷

ISBN 7-81052-877-7/1·63

定价 20.00 元

如有影响阅读的印装质量问题,请与出版社发行部联系调换

序

杨君柏岭的博士论文《近代词学思想的构建》在前年通过答辩,很得好评,后又被华东师大和上海市推荐参加全国百篇博士论文的评选,经两年的“打磨”,易名为《晚清民初词学思想建构》,即将梓行,索序于我,盛情难却,不能不勉力为之。但因未将其原来的论文带到广州再作细阅,只能凭记忆和印象说些多为题外的话。

杨君之书所论者为近代之词学思想,令人不得不从近代说起。

我国的近代确实是历史的激变时期。李泽厚先生在其《中国近代思想史论》的《后记》中说过:中国近现代是一个动荡的大变革时代。随着这种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各方面剧烈的震荡、变革,中国近代思想在短短几十年内,从封建主义到社会主义,像雷奔电驰似的,越过了欧洲思想发生成熟的数百年行程。这样,一方面就使整个思想带有浮光掠影的特征,对好些问题经常

一掠而过,未能得到广泛深入的展开,未能产生比较成熟、完整、系统、深刻的思想体系,在理论领域显得肤浅、贫乏和杂乱;但是,另一方面这又使思想紧紧随着时代急迫课题迅速前进,密切联系了现实生活中的重大实际问题。普列汉诺夫说过:“每个时代都有它自己中心的一环,都有这种为时代所规定的特色所在。在世界范围内,近代资产阶级民族民主革命由西而东,如果说,这独具特色的一环在十八世纪末十九世纪初的德国,是那抽象而深刻的古典哲学;在十九世纪的俄罗斯,是革命民主主义者的文学理论与批评;那么,在近代中国,这一环就是关于社会政治问题的讨论了。燃眉之急的中国近代紧张的民族矛盾和阶级斗争,迫使得思想家们不暇旁顾,而把注意和力量大都集中投放在当前急迫的社会政治问题的研究讨论和实践活动中去了。因此,社会政治思想在中国近代思想史上占有最突出的位置,是它的主要组成部分。其他方面的思想,如文学、哲学、史学、宗教等等,也无不围绕这一中心环节而激荡而展开,服从于它,服务于它,关系十分直接。”之所以将以上整段话录于此,是因为可用以观照近代思想和近代文学的总体特征,并为杨柏岭的论题作准确定位。

我国古代重经、史和诸子之学,文学的地位在它们之下,“一成人,便无足观”与其说是社会的评价,不如说很像是文人的“忏悔词”。即便如此,文学之中也还是要分出尊卑的,由于诗的“言志”,文的“载道”,仍使之能居于众体之上;而通俗文学的小说、戏曲,则如鲁迅先生所说,“中国向来是看作邪宗的”。但是,以康有为、梁启超为代表的近代维新派,看到了时代已变,文学不得不变,这种变化,既应涉及社会的精英,也应遍及社会的下层。诗文作为知识界、思想界人士表述思想、抒发情感的工具,本身自应负起放眼世界、图存救亡的社会责任;与此同时,社会

的精英也有唤起民众的义务,对未能普遍接受教育的大众来说,小说、戏曲无疑是很好的“新民”工具。西方的列强,尤其是东方的日本,对我覬觎已久,老大的中华帝国被蚕食鲸吞、瓜分豆剖,已面临着亡国的危险,唤起民众、救亡图存,也就成了文学的首要任务。为此,近代文学随着康梁倡导的变法维新运动而变革,本着“开民智,振民气,鼓民力”的目的,“诗界革命”、“文界革命”、“小说界革命”、“戏剧改良”、“曲界革命”的口号相继提出,也出现了一批新面貌的作品。

以诗而言,康有为说,“新世瑰奇异境生,更搜欧亚造新声”(《与菽园论诗兼寄任公、孺博、曼宣》),维新派人士如谭嗣同,是热衷于“更搜欧亚”的,他喜欢将“喀私德”(Caste的译音,指印度的种姓等级制)、“巴力门”(Parliament的译音,英国议院名)之类入于诗,正如梁启超所云,是“以堆积满纸新名词为革命”。当然,也有如同黄遵宪所作的“不名一格,不专一体,要不失为我之诗”,真正为“诗界革命”提供创作的实绩,树立了旗帜。文章也打破了桐城派一统天下的局面,梁启超“欧、和文化”结合中国传统,平易畅达,笔端常带感情的“新文体”,拉近了与下层读者的距离,而“言文合一”之倡,更导“五四”白话文之先。经学家俞樾本来鄙视小说,在读了《三侠五义》后改变了观念,还亲自动手改编,康、梁以外,王钟麒、黄摩西等都非常重视小说,梁启超更能指出小说能因其“熏”、“浸”、“刺”、“提”而使读者“移情”,以小说为“文学之最上乘”。虽说此时所论过于重视政治小说,但近代谴责小说以至“五四”前后新小说的出现,当与以上诸人所倡大有关系。戏曲原本一直为传统的传奇、杂剧所限,但在“雅部”与“花部”的竞争中,前者不断落败,改良之势难以阻遏。随着世纪之交民族革命思潮的兴起,陈去病认为,对于民众来说,戏曲无异于信史的教育,可以“通古今之事,辨明夷夏之大防;睹故国之

冠裳,触种族之观念”,因此,提倡“或编明季裨史而演汉族灭亡记,或采欧美近事而演维新活历史,随俗嗜好,徐为转移,而潜以尚武精神、民族主义,一一振起而发挥之,以表厥目的。夫如是而谓民情不感动,士气不奋发者,吾不信也”。(《论戏剧之有益》)无论是梁启超作《新罗马》的向欧洲取材,还是吴梅作《风洞山》的写南明旧事,都是立足于感动民情、奋发士气,虽是传统的形式,但后来话剧运动的兴起,其精神应是导源于此的。

词是诗的近邻,诗、词经常并称,词又是曲的伙伴,词、曲也常相连;如从雅俗而言,诗雅,曲俗,而词则介于二者之间,不雅不俗,而既雅又俗。不知是否“常山之蛇,击首尾应,击尾首应”,在近代文学的变革中,雅俗两头都被“击”而应,发生了变化了,而诸多文体的“革命”中,似乎只失落中间的词,而未见有“词界革命”口号的提出。面对时代的风雨,词至多只是“吹皱一池春水”而已。以清末四大家而言,王鹏运等人在八国联军侵入北京之时,曾作《庚子秋词》,并非与时事隔绝,因安维峻弹劾李鸿章被革职,因珍妃、瑾妃胞兄志锐支持光绪变法而怵慈禧,被降职远方,王鹏运都有词相送,感慨甚深。文廷式是支持新政的帝党成员,先被慈禧革职,变法失败又逃亡日本,其词也有与时事相关者,如《广谪仙怨》借唐玄宗“西狩”事讥评时事,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朱孝臧、郑文焯所作词,也与时事政治相关,尤其是庚子、辛丑,国脉如丝,哀悯之情,难以掩抑。但是,即使是上面所说的那些词作,也多为悒郁凄怆、幽忧怨悱之作,在声情委婉中,多沿芳草美人的路子,讲比兴寄托,与诗、文、小说、戏曲的直切、激越、明白、平易相距甚远。

词虽是广义的诗歌之一种,但由于历来以婉约为正宗,“风云气少,儿女情多”,不及诗之因“言志”功能而体尊,而因主于“缘情”而被视为“小道”。至于其文体特征,则如王国维《人间词

话》所说：“词之为体，要眇宜修。能言诗之所不能言，而不能尽言诗之所能言。诗之境阔，词之言长。”近代历史风云中的词，似乎是被遗忘的角落，而相关的理论，也大致如此。这或与其文体特征以及“婉”而“约”之的潜势力有关。

十多年前，徐中玉先生主编《中国近代文学大系》的《文学理论集》，召集系里的部分教师和研究生同襄此事，按照文体的不同，而作相应的理论搜集编辑，我有幸参与其事，负起编出其中词学理论部分之责。徐先生对此项工作抓得很紧，经常召集我们开会，我虽翻阅了不少清人集子，对其中近代以来的词论作了爬梳、搜罗，也对叶恭绰编选的《全清词钞》等书作了不少摘录，但是，每当开会时，我总是心中惴惴，而当听了他人的汇报，则深感诸体多有与时俱进的理论，惟独词论实难以时代气息观之，也因此而感到惶惑，深怕因词论与其他文体理论的不称而耽误了编辑之大事，但也在将近代词论大体摸过一遍之后，心中也有了底。至今，《中国近代文学大系·文学理论集》出版已十年，似乎还未听见多少意见，说其中遗漏了重要的理论。

大概在六年前，我所在的教研室酝酿从整体研究上海近代文学一事，而要写出完整的上海近代文学史，当首先要做好分体的编年工作，可能因为我曾参与过前述“大系”的工作，让我再作近代上海词学编年一事。而我则因在1999年招收了杨柏岭作博士生，且知他原先从事过况周颐以及近代词学的研究，遂将此项工作转交给了他来做。柏岭在努力于学业的同时，又将很大部分的精力投入到了“编年”中去，终于完成了此事，由他编著的《近代上海词学系年初编》一书，也在去年七月正式出版。

柏岭原已从事近代词学研究多年，又为上海的近代词学作了编年，虽受到地域的限制，但是上海毕竟是近代文学最为发达的地区之一，晚清的几位词学大家，多在上海度过了后半生，熟

悉了上海的词学,就几乎掌握了词学的半壁江山。因此,柏岭的博士论文选题也就很自然地被框定在近代词学的范围之内。他挟着“编年”的资料余势,更充分发挥了自己善于思辨的长处,似乎并不是很费力地就写出了三十多万字的初稿,我在读后深感他能够在纷纭复杂的材料中理清线索,准确地在对历史的清理中作逻辑的建构,对他如此地善于构筑理论框架,举重若轻,我是由衷地高兴。要做学问、搞研究,“才”与“学”两者都很重要,但如果识见不高,而对一大堆材料,难以理清头绪,无法驾驭,出不了观点,则难说是真正的研究。有了这份了解,我对柏岭充满了信心,而事实上我也未提出多少意见,他的论文定稿就很漂亮地完成了。

我曾在为杨柏岭的师兄彭国忠《元祐词坛研究》所写序言中说过:“历史的发展固然有其自身的规律,但人们观照历史,却往往看到了无序的现象,因此,如何在对历史作客观描述同时,努力探索其发展规律,而这种探讨又不是主观臆想,而是尽量接近客观规律本身,却是很难办到的。如果做得比较完美,我们就可以说是做到历史与逻辑相结合了,反之则难以用此标准评判。”“近年来,许多青年学者由于对理论的重视,所写著作多能体现出这方面的修养,但与此同时,也会有运用某些理论解决问题而出现的‘过度阐释’之弊,使‘逻辑’凌驾于‘历史’之上,游离于‘历史’之外。”在这里我还要重申这一看法,并对柏岭能够在其著作中做到真正的历史与逻辑相结合,而感到由衷的高兴。

柏岭所著,分为总论和上、下篇。总论名之为《复古求新的时空观览》,上篇为《原人尊体的慧心之游》,下篇为《辨径还浑的终结之旅》。这样的三部分划分,和带有复合定语的标题,我以为是有深心在焉。

如前所说,近代词学与他体文学及相关理论不同,是“革命”

或“改良”口号惟一未曾“光顾”的主要文体,还如历史上多少代一样,是通过以复古来求新变,因此《总论》的命题是抓住了根本的。而“时空观览”则突破了一维的单向度,注意到了词及词学的地域特征,在文学研究中体现出很强的地域文化观念。《总论》不似其他各文体文学理论之主要从时代风云之变作观照,而是着眼于近代词学理论的实际情况,不从政治学、社会学立论,而是抓住了晚清词学中最主要的几个内容:正变说、比兴说、词史观,以及自明清之交以来所形成的词学地域分布和相关的乡邦之恋,展开了层次分明、逻辑严密的论述。就个人的感受而言,我对其中第四章尤为欣赏,因为柏岭在对诸说进行了论析后,梳理出了文献中所表现出的主要词史观念,并与从晚清到民初的历史阶段相对应,准确地找出了它们之间的时代共感,词虽风云气少,但并非全无时代投影,柏岭是抓住了这一点的。

《上篇》的命题,当兼从创作主体和词之本位来立论。词人意识和词心观念侧重在主体的人,后面各章则就创作客体的词,具体为词的体性、笔法、声调、品第、境界,以及过去论者很少论及的感、雅、远等,清理了近代词学在以上理论范畴中的发展演变。“尊体”是老说法,但柏岭能借此说装入了诸多概念,论出了新意。“原人”是新说法,黄霖等诸位先生在《原人论》中提出了“原人”的命题,并就“心化”、“生命化”、“实用化”展开论述,想必柏岭从中受到启发,而有了自己的一番演绎论证。在纷纭复杂、又似多有重复的众多说法中,能抽绎出新见的主要之处,寻绎其间的传承、演进关系,理清头绪,并出之以逻辑严密的论证,真不是容易的事情。而柏岭却能将多人所论的精华尽括其中,纳入词学体性论、创作论、鉴赏论、境界论等诸多范畴,条分缕析,说得头头是道。此篇中的三家词心异同之辨,对词体地位及体性思考的多层定位,对词体音乐性作审美阐释而确立的“源”、

“实”、“力”、“则”四点等等,都能启人心智。我想,倘自己并无慧心,在论述“词笔慧心”时,也难以与前人心灵相交,想必读者在读此书后,是会感受到作者的慧心的。

《下篇》称之为“终结之旅”,当然是因为近代处于古代与现代之间,词学到了近代与现代之交,本来就是终结点,而以“旅”命之,应是论述其历史的流程。柏岭在此篇中,作了以人为目的论述:对周济,着眼于他关于宋四家的门径之说,探究其浑化理念;对蒋敦复,抓住其“有厚入无间”,而以鼓荡个性观之;对刘熙载,在论者所注意的“词品说”之外别具手眼,论其人文合一的儒雅;对谭献,就其最著名的“折中柔厚”说,展开了四方面的论述;对陈廷焯,对其反复强调的“沉郁说”,道出了“本末难修”的己见;对沈祥龙,拈出“词有三要”,而发掘其中的思维取向和艺术指归;对同为临桂词人的王鹏运和况周颐,对著名的“重拙大”说提出自己新见,别喟“词之三要”之“坚果”。尤其值得注意的是:篇中并不视王国维为传统词学的终结者,而将王氏与况周颐并置于同一章中,以“新旧共存间的对话”为题,作了二人词学思想的全面比较;而且,作者并未忘记近代文学中鼓吹“革命”最力的梁启超,评议其词学思想,并视之为传统词体观的终结。

我曾参与撰写《中国词学批评史》一书,此书虽获得了第三届夏承焘词学一等奖,但就我所撰写的部分而言,至少有两点明显的不足:南宋部分遗漏了王灼,近代部分遗漏了梁启超。今日想来,之所以会如此,可能一是受篇幅所限,二是因王灼多被视作曲家而非词家,梁启超的词论也远非他的其他理论可比。杨柏岭所论及的近代词学中的刘熙载、况周颐和王国维,都曾见于我在该书中所写的章节,而他不为我的论述所限,发表了自己的许多见解。我在读到关于况周颐的论述时,是深为其对“重拙大”的新见而折服的,这就不仅仅是“起予之叹”了。而他将梁启

超的论词思想视做传统词体观的终结,虽作“体”的限定,而实际上是否定了我将王国维作为传统词学终结与新变的意见,虽说梁之说多在于“外”,而王说才入于“内”,但就现代性而言,梁似乎更在王之上,更应具有“终结与新变”的资格。为此,我实在是深感韩愈《师说》的亲切,因为确实是“弟子不必不如师,师不必贤于弟子”,也深叹“后出转精”一语确为不虚了。

当然,柏岭此著也并非完美无缺的。从命名的“建构”即可知,这是不同于“史”的写法,相较而言,前者的主观性更强,而他在写作中为考虑自己如何构建,也就难免此中的人工痕迹。条分缕析,见于行文中尚易,见于标题则未免要寻找对偶性、整一性的语言,我原来曾对他说过不要给人留下用语新奇之感,现在虽有很大改进,但似乎未能尽去。再者,将况周颐和王国维加以比较固然很有新意,但倘能分作专论应更能全面反映出二人的词学思想,因为这两大家影响至巨,虽可比而又不能尽于此;而于此点也可看出,一旦以“建构”方式来写,见于前就不能出于后,其弊很难克服。虽如此,此书的创见、长处都是主要的,作为观者,虽也知道挑担吃力,也知道评球容易踢球难,但柏岭既是我的学生,我宁可客气以至苛求,也不能尽说好话。

柏岭是安徽定远人,三十九前,我曾在此地参加过“四清”运动,从全椒而定远,更靠近了朱元璋的家乡凤阳。我在此地大半年的生活中,曾目睹过它的贫穷落后,对“自从出了朱皇帝,十年倒有九年荒”,有过真切的体会。也曾在这“激情燃烧的岁月”里,在低矮的草房、昏暗的油灯下,尽己所能地开展社会主义教育,激情固然燃烧过,却更被农民们用干烟叶卷成的土烟“燃烧”得呛咳不已,熏出了不知多少——并非是痛苦的眼泪。

回想起在定远之时,四清工作党委每次开会,全公社的工作人员都集中到了并不为“集”的东兴集,那是连一口井都没有的

“集镇”，最“宏伟”的建筑也仅仅是茅草顶、土坯墙的“烟麻公司”。而柏岭祖上的家，却是大瓦房，其“出身”可以想见。在我参加“四清”之时，柏岭还未出生，也未能经受阶级斗争的洗礼，成人之时，党的中心工作已经转到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于是，他一路读到了博士毕业，作出了令乡亲们为之骄傲的业绩，在我也为之骄傲之时，实在是为他的生之也晚而由衷高兴。不知不觉间，近四十年过去了，我还经常会想起那方土地那方人，还可以说比柏岭更地道的定远话。在他成为我的学生时，我就曾说过与之同去定远的话，可现在南来广州，离此地就更远了，不知此愿还能实现吗？

当今的时代，激情不再燃烧了，国家却在真正理性地前进，到处广厦千万，想必定远也已是面貌大改了。我比柏岭年长二十五岁，未能亲身体会到我的伟大同乡孙中山先生的伟大，却在见证了共和国五十五年的历史后，真正体会到了我的伟大本家邓小平同志的伟大，今年恰逢他的百年诞辰，更从心底里感激和怀念他。

再次重复我为彭国忠《元祐词坛研究》所写序中说过的这段话：

“诗云：如月之恒，如日之升。明天是美好的，我坚信！”
是为序。

邓乔彬

2004年6月30日

于暨南大学明湖苑临风轩

前 言

本课题所说的“晚清民初”，上限起自清代乾嘉之际的词学新复兴期，下限基本以“五四”运动为界，但根据论题的需要，本着词学思想发展的规律，也多有延伸，直至二十世纪三十年代。这时期词学思想有着独特的个性和历史意义，不仅处于传统词学理论的辉煌时刻，也保留着向现代词学过渡的痕迹。因此，集中解读这时期的词学思想，颇有意义。

确立这个时限，要义在于词学思想发展的阶段性特征，晚清民初的词学实则为词学的晚清民初。施蛰存先生曾指出，近代文学不是近代社会的文学，而是文学上的近代，是具有近代精神的文学^①。虽然人们不能完全同意他对各文体近代时限的具体划分，但他界说文学史的标准对我们却有很大启示。至少让我

^① 施蛰存：《历史的“近代”和文学的“近代”》，见《北山四窗》，34～35页，上海文艺出版社，2001。

们不必局限于朝代更迭、政治理念及历史分期的框框中,而人为地割裂学术思想史的某个特定时段。类似的观点,在近些年学术思想史的研究中也有突出的表现。如吴熊和先生便主张明清之际的文学即是文学上的明末清初,要把它作为“前后相继、传承有序的一个相对独立的发展阶段来研究”^①;朱维铮先生认为“晚清”这个中外学者通用的历史概念,其上限不一定是鸦片战争这个“通用的标识”,尤其从清代学术史的全过程来看,“恰以十八世纪末自称太上皇的乾隆死去为契机,出现了转折点”^②;业师邓乔彬先生撰写《中国绘画思想史》时,单设一章论述那个“年份难以确定的较长时期”的明末清初,因为绘画思想史未能留下近代精神的清晰印痕,所以不以鸦片战争作为划界的依据,而是集中审视“从1796年开始的嘉庆朝到‘五四’运动”这段史程^③。

人们常以“近代”界说这个历史时段,且习惯上以鸦片战争为上限的通用标识。这种做法,实则受到西方汉学家“冲击—变化”思维模式的影响。其实“时世人心趋变”的近代士心主题,鸦片战争之前实已潜滋暗长且呈逐渐蔓延之势。近代史专家陈旭麓在梳理过人口、财政、武备、吏治等层面的翔实数据后,指出乾隆盛世之后,“人心在变,士风也在变”,已经由盛转衰,“19世纪一开始就是暗淡无光的”^④,即便没有坚船利炮的震撼和欧风美雨的席卷,清王朝也将走向衰亡之路。在近代词学研究上,立足

① 吴熊和:《〈柳洲词选〉与柳洲词派》,见《吴熊和词学论集》,371页,杭州大学出版社,1999。

② 参见朱维铮《求索真文明——晚清学术史论》的《题记》,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

③ 邓乔彬:《中国绘画思想史》,1217~1218页,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2001。

④ 陈旭麓:《近代中国的新陈代谢》,37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

词学思想发展的实际情况,溯其上限者也大有人在。严迪昌先生在《近代词钞·前言》里,便讨论了“近代”这个迄今犹存争议的概念;在《例言》第二则里又明确提出:“本编冠名‘近代’,断限既以时世人心趋变为准,兼依词史衍变走向为参照,故不尽据社会政治事件之猝发,而兼及上述两方面之先兆演变期。”^①也就是说,鸦片战争仅仅是中国近代史开端的“征兆”,但我们不能因此而忽视之前的“先兆”,二者存在一种不可抹杀的血缘关系。

不过比较而言,同为历史概念,“晚清民初”比“近代”更适合表达这时期词学思想的生存状态。作为一种旧体制,词学思想并非人们所说的凝滞不动,而是敏感地随时世人心趋变的刺激而起变化。从对乾隆盛世后暗淡无光社会的积极反映开始,直至后期出现梁启超、王国维等人具有鲜明近代学术特征的词学主张。但整体上看,这时期词学思想呈现出传统词学理论的总结性,一些观念仍是前代词学思想惯性的延续,其中顺应时势变化出现的新气象,观念上也以传统艺术精神为多。若用“近代”这个历史概念,可能使人们更倾向从“近代精神”角度接受这时期词学思想。因人们心中的近代精神内涵不同,也必然引起诸多争议。使用“晚清民初”这个历史概念,既可以顺延这时期词学思想的总结性,又自然包含这时期词学内部生发的新气象,甚至那些具有近代精神的词学主张。

鉴于此,乾嘉之际开始的词学界反思理当属于晚清民初词学发展的一段有机的史程。如出于强化词体的经世致用功能,主张比兴寄托,究心于词体艺术性的追寻;由于对时世变化的敏感反映,提出“诗有史,词亦有史”;本着抬高词体及词人地位,对词人予以德性设定,给以品格上的崇高;基于强化以乡邦意识为

^① 严迪昌:《近代词钞》,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6。

核心的区域观念,掀起地方性词微体词集的编辑风气……关于这些主题以前词家也有不同程度的论述,但多是在乾嘉之际得到了强有力的推尊或彰显,且在鸦片战争后延续、拓展和再反思。相反,忽视“先兆”期,以鸦片战争甚或以同光时期的谭献等人为近代词学的上限标识者,在解读先兆期词学思想时便会出现种种矛盾和困顿,抑或是在评析他们理解的晚清词学时,又会出现“渊源有自”之类的不必要的补充和说明。譬如蒋兆兰《词说自序》理解的“晚清词学”,即以“在南则有复堂谭氏,在北则有半塘王氏”为始,但“逮乎晚清,词家极盛,大抵原本风雅,谨守止庵‘导源碧山,历稼轩、梦窗,以还清真之浑化’之说为之”,就不得不把“晚清”词学与先兆期的周济词学作一整体观照。

讲清了晚清民初词学的时限,下面再说本课题写作的意图。在我看来,“学术”与“思想”有区别也有联系,二者虽不可以互相取代,但可以相互包容。“词学思想”简单地讲就是人们对词学的看法,但这又不是一般意义上的观念或意识,而是那种既能彰显词体特征、又能凸现时代心理和个性的一种艺术智慧形态,是词学观念、意识的一次心灵的升华。既然想对晚清民初词学思想体系予以构建,自然就无法回避主观设定的人为性。就词学思想史而言,晚清民初词学思想无疑是那最为晶莹的时刻,一百余年的生命里程并不算短,在诗文等文体忍耐不住阵痛向阳光绽开笑颜,倡言“革命”时^①,她“顽强”地沉浸在雄厚的沉积力度中,折射着诗文品味不出的苦痛和辛酸。尽管她追逐的多

① 当然,梁启超的“诗界革命”中的“诗”应该是广义的,从《饮冰室诗话》里可以看出是含词曲在内的。不过,“词界革命”在此时梁启超的诗学思想中并未能占据突出地位,何况像他那样使用广义诗概念者,也毕竟属于少数。